

## ■ 近现代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

2005-11-28

作者： 宋素红

关键词： 近现代 女新闻工作者 | 阅读：389次 |

内容提要 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闻史上，曾经涌现出大批女新闻工作者。作为同 时代女性中的佼佼者，她们之所以能在当时胜出其他女性，有赖于客观生活环境和 主现个人努力。包括家庭环境和地域环境在内的客观环境为她们的成长提供了良好 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而自身的主观努力则促使她们成为有影响的女记者。与同业中 的男性相比，她们有鲜明的特色与传统。这主要表现在：艰苦办报、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事业为主兼顾家庭的职业精神，以及她们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女性特色。

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闻史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女新闻工作者，有的名垂中国新闻史， 有的默默无闻。1949年以前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精确数字已无从考察，但据《中国新闻年 鉴》1983~2000年所列出的解放前中国新闻界名人中男性与女性之比，可以看出女新闻工作 者在整体中所占的大概比例。

《中国新闻年鉴》辑录新闻界人物的标准是：“第一， 毕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名人；第二， 虽然不是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但亲自创办过新闻报刊的名人；第三， 虽然不具备上述两点， 但曾经在新闻界担任过主要职务，并在新闻界有一定影响的名人；第四， 某些对中国新闻事 业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外国人。” [1]

据笔者统计，按照这一标准，1983-2000年的《中国新闻年鉴》上共辑录了2417位中 国新闻工作者，其中女新闻工作者157人，占总人数的6. 5%，平均15位新闻工作者中有1 位女性。撷取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各时期有影响的女新闻工作者若干位，对之成才原因进行 综合分析，总结其特色与传统，可以看出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历程。

### 一、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成才原因分析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是同时代女性中的佼佼者。她们之所以能在当时胜出其他女性，有赖 于客观生活环境和个人主观努力。包括家庭环境和地域环境在内的客观环境为她们成长提供 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而自身的主观努力则促成她们成为有影响的女记者。根据对中国 新闻史上影响较大的50位女新闻工作者综合情况的列举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主客观条件 对她们的影响。

#### (一)客观环境的因素 1、地域环境的影响

在50位女新闻工作者中，广东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湖南和江苏两 省籍的女新闻工作者最多，分别为8人和9人，占所统计总人数的32%。其次是浙江7人， 占14%；福建6人，占12%。其次是北京3人，广东、四川、山西各2人，其余省份各1人。

统计显示：江浙福建和湖南是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集中产生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于这些地方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传统的封建观念中不利于女性成长的因 素最先在这里受到冲击。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和“片帆不准下海”的海禁政策，全国只有广州一地 为通商口岸，同时，福建和江浙等地区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得较为充分的地区。资本主义与 封建主义是相对立的，前者的发展势必会削弱后者的力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厦 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地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这 些通商口岸向中国倾销廉价商品，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而且在这 里开设报馆、书店、学校以及印刷等企业，输入西方文化。其中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自由 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猛烈冲击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和理论也输入中 国，促使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高了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同时，女子无学无业而分利 的情况加重了男性的经济负担，社会上的开明人士也逐步不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然，开始 重视对女子的教育。从家庭教育到私塾教育再到教会学校和正规学校教育，中国女性中有知 识者逐渐增多。这构成了中国早期女新闻工作者的人才基础。

广东是维新变法的发源地，广东籍的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派领袖。湖南是19世纪维 新派最为活跃的省份，也是维新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省份和地区，同时还是女学开展得比较 好的地区。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 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妇女解放进行得也相 对 靠前。谭嗣同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湘报》主笔唐才常曾向 妇女免费赠送《不缠足歌》和“云头方式鞋”以鼓励放足，《湘报》陆续刊出不缠足会题名 录和捐资发起者名单。不缠足运动对夫权的否定，促进了妇女的觉醒。

开放的环境和维新变法的开风气作用，使江浙福建和湖南等地方对妇女的封建束缚相对 较弱，为妇女成长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有利于妇女接受开放、维新和革命思想，有 利于妇女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奋斗。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jin 文章 jin 动态

SEARCH >>

■ 上一篇 PREVIOUS MORE >>

###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 韩鸿 |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下一篇 NEXT MORE >>

### • 媒介管理之可持续发展战略观

作者： 罗晓娜 | 2006-05-29

一、媒介与管理 媒介管理，顾名思义即是指存在于媒介领域内的管理问题。媒介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性质、类型及功能的定位都是随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与之对应的一切管理与营运也是应势而动。……

■ 动态 NEWS MORE >>

-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 2、家庭环境的影响

统计资料显示：在有出身资料的女新闻工作者中，归纳其相同的家庭出身，前二位是：知识分子，官僚。其次是商人，军人，地主，小职员和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僚、商人家庭环境为这些女新闻工作者在经济和思想氛围上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活、生长环境。相对于其他较为贫穷家庭的女子而言，她们的生活环境比较有利于她们的发展。

近代知识分子身居斗室，心忧天下，关怀国家和社会的人世精神使他们在思考国家社会的命运时，能够超越传统思想中消极的因素。表现在妇女问题上，就是能够超越传统社会歧视妇女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让女子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学而优则仕”，一些从知识分子发展而来、继承了儒家思想精华的官僚(包括军事将领)，以国家民族命运为重，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宁可丢官舍家或舍命去保卫国家。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的父亲康有为青年时代多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以救国救民；林宗素的叔叔是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扬威舰管带林履中；秋瑾的祖父是不甘外国侵略分子欺侮而弃官回家的秋嘉禾；张默君的父 亲是同盟会会员和南社社员张伯莼；陈学昭的父亲是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教师。商人长期受商品经济的濡染，有一定的平等自由思想，头脑里的封建思想相对较少，对女子的封建束缚相对较弱，女子读书的机会相对较多，出生于这样家庭环境中的女子自幼就有较为宽松的生长条件。女子读书使女子有了人格独立的可能。

## 3、教育的影响

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戊戌时期的女新闻工作者大多因有开明的家长而能够接受家庭教育。从辛亥时期起，由于女子留学教育和女子教育的实行，广大女子接受教育的途径开始增多，受教育的女子人数大幅增长。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女新闻工作者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中一半左右受过大学教育，也有一部分海外留学的女性。

与当时女子从事教师、医生和律师等职业一样，妇女从事新闻工作也需要较高的知识含量。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女子从事新闻业提供了条件。

### (二)个人主观因素

与客观外部环境相配合，富于反抗封建传统精神，爱国民主的进步思想等个人主观因素是女新闻工作者成才的另一必要条件。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绝大多数有反抗封建传统的精神，这一点在婚姻问题上有明显的体现。她们敢于冲破家庭包办婚姻，追求自己的幸福。秋瑾20岁时“以父命，非本愿”，与湘潭富户子弟王廷钧结婚。她那热情豪放的性格、迥于流俗的理想和追求与王廷钧格格不入。1903年，秋瑾随王廷钧进京，在那里接触到新书报，思想日趋先进，二人之间的距离更大，不时发生冲突。1904年，秋瑾辞别家庭去日本留学，从此献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鼓吹妇女解放的斗争。三十年代知名的《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也是旧式婚姻的不幸者，更是旧式婚姻的反抗者。她从小就定下婚姻，17岁出嫁，21岁守寡，夫家为她建了一座精致的房子让她安分守节，但受过新思想熏染的沈兹九无视这种强加在她身上的无情枷锁，反而更促成了她逃脱的决心。她带着私蓄的金钱，只身留学日本。

爱国民主的进步思想是促使女性投身新闻事业的因素之一。我国最早的新闻系女毕业生之一、北京平民大学学生徐女士(现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是20年代我国女新闻工作之一。徐女士祖籍无锯，1904年生于上海。她的曾祖父徐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化学家。五四运动时，她正在天津女师求学，就曾和邓颖超一道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据徐女士回忆，周恩来曾到天津女师提倡语体文，在这里求学的她尝试着用白话与新式标点符号办了一份名为《群众》的小册子。由此，对新闻事业产生浓厚兴趣，产生了念新闻专业的念头。1924年，徐女士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她曾在天津《商报》编“杂货店”副刊，兼做外勤记者。离开《商报》后，还不时为《大公报》、《益世报》写稿。徐女士说，她对新闻事业产生兴趣，选择新闻专业，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因 在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她本人所具有的爱国民主思想是她从事新闻工作的内在原因。[2]

近现代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中坚大多出身于中等以上人家，这样的家庭环境她们生活无忧，有受教育的机会，娇贵的习气不曾染到，劳动的本能没有丧失。有思想，有道德，有勇气去做事，有胆去耐苦。出身贫穷家庭的女性在解放区女记者中占有一定比例，这表明在解放区，“第四阶级”(无产阶级)的女性有了翻身的机会。

二、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是众多女性中的佼佼者，与同业中的男性相比，她们有鲜明的特色与传统。由于她们的参与，中国新闻事业才更加绚烂多彩，广大妇女的声音才有被表达的可能，知识妇女的价值有了体现。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和传统表现在：艰苦办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事业为主兼顾家庭的职业精神，以及她们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女性色彩。

### (一)艰苦办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作为维新变法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中国的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产生。相对于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新闻事业来说，这些都是新生事物；是新闻事业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新生的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不仅受到经费和人才不足的制约，还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但都没有吓倒女新闻工作者，而是体现出一股女性素有的百折不回的韧性。

经费紧张一直是制约妇女报刊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并没有使妇女报刊的发展停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新闻工

作者的奋斗精神。尽管争取女子赞助,《中国女报》创办初期还是经费短缺;秋瑾抱着强烈的为女子呼吁解放的愿望,使这份报纸坚持出了两期,第三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只好停刊。

面对反动当局的压制和迫害,女新闻工作者表现出不怕牺牲的勇敢坚毅精神。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有为妇女解放、社会进步不怕牺牲的精神。秋瑾为办《中国女报》呕心沥血,最后献出生命。1926年,在段琪瑞政府造成的“三·一八”惨案白色恐怖气氛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妇女部决定于1926年9月15日出版《妇女之友》,揭露中国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情况,探讨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和妇女解放的道路,论述妇女解放必须组织联合战线的道理,提倡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的结合,以打破“三·一八”惨案以来北京妇女界的沉寂气氛。该刊的出版,在当时奉系军阀严密控制的北京,犹如一粒光辉灿烂的星火,划破反动统治者统治下黑暗的夜晚,得到了妇女界的注意和赞扬,也引起了奉系军阀的仇视。1927年3月20日,奉系军阀开始在北京大肆搜捕进步学生,查封进步刊物,《妇女之友》也被军阀政府警厅列为被取缔和惩处之列。当日上午,该刊主编、北京大学教育系学生、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张把兰在家中被捕,后与李大同等20位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同时被绞杀。抗战期间,《新华日报》从武汉撤退时,女报人项泰在湖北嘉鱼被日寇的飞机炸死在“新升隆”轮船上,年仅23岁。《新华日报》的女新闻工作者胡南于194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49年12月27日遇难,年仅30岁。[3]1947-1948年间,浦熙修在上海《观察》、《展望》周刊和香港《文汇报》连续发表署名通讯,为南京政府频频恫吓,但她并没有畏惧。1948年11月6日深夜,浦熙修刚刚为香港《文汇报》写完题为《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通讯,尚未及邮寄,国民党特务前来将她投入监狱。毛泽东称她为“坐过班房的女记者”。、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妇女刊物常常因此而面临时刻停刊的危险,但这些刊物编者并没有气馁,而是想方设法转移阵地,延续刊物的命运。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委员葛琴指导保育会秘书贵婉兰和陈怀白筹办的《浙江妇女》于1939年7月15日在金华出版。1940年下半年,浙东形势紧张,日机连续几个月天天轰炸金华,编辑人员只好在逃警报中办公。“警报一响,我们就提着一大包稿件,跑到城外找个僻静的凹地坐下,随即就在膝盖上办公”。[4]1941年4月中旬,《浙江妇女》随着保育会撤出金华,先后到过武义、宣平、松阳、丽水、江山等县,沿途都由刊物编者背着稿件,翻山越岭。在丽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印刷厂,稿子刚刚排出初样,5月21日印刷厂就被炸毁了。主编秦秋谷又带着稿子到江山,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到7月底终于把第四卷出齐。几位女同志,总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双肩挑着刊物稿件,到处转移,直到1942年4月金华、丽水先后被日军占领而被迫停刊。从《浙江妇女》出版的始末中可以看出女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坚持办报的奋斗精神。

## (二)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专业能力,献身事业的职业精神

女新闻工作者有工作上的任务,一旦结婚就有家庭的琐碎家务。同时,家庭小一有了孩子,常使她们身上的负担加重。虽然女新闻工作者受传统的束缚相对较少,但她们不可能一下子挣脱家庭事务,所以,家庭事务还要占用她们部分时间和精力。同时,社会上对女记者的偏见也是她们所不得不面对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们要想做出和男性同业者一样的成绩,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甚至做出一定的牺牲。“一个女记者常常比一个男记者,更为他人所注意,她们的信仰是庄重,庄重,第三个还是庄重。她们在工作上,并没有比男记者逊色,而家庭,儿女和健康,对于一个女记者的发展,阻碍是太大了。”[5]

秋瑾在主持《中国女报》时,完全抛弃了家庭的拖累,将孩子放在湖南夫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和办报活动。《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一边主持整个刊物的所有事宜,还要料理家庭琐事。“拉稿、改稿、发稿、会客、开会、接电话,加上省不了的家常琐事:柴米油盐酱醋糖……。每天一睁开眼,就像爬上了旋转不停的车轮,被它们带得头晕眼花。”[6]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兹九还是将刊物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根据地女记者戈扬在敌后做新闻工作时,写了许多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新闻和通讯,并总结自己的采访经验,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笔写《新闻采访与写作》,耳边还响着枪炮声。

从最初采访妇女新闻发展到和男记者一样大的采访圈子,女新闻工作者的采访范围不断扩大。《大公报》资深女记者也是该报第一位女记者蒋逸霄在天津时,是采访妇女问题的记者兼《妇女》周刊编辑。妇女刊物的女记者以采访妇女新闻为专职。彭子冈在《妇女生活》任记者时,采访对象大多为女性。如《冰心女士访问记》(《妇女生活》1卷5期),《一个话剧女演员的自白》(《妇女生活》1卷6期),《史良律师访问记》(《妇女生活》2卷4期),《王孝英访问记》(《妇女生活》3卷2期)等。子冈没有受过新闻教育,但她的新闻作品融合了散文和小说的写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她的《史良访问记》在读者中激起了很大反响。《她们在巨变里》(《妇女生活》4卷7期,1937年4月16日)则是写江西农村妇女在红军到来后发生的生活巨变。在抗战爆发后,子冈到了武汉,汉口《大公报》称誉她是“一位现阶段中典型的女性:活泼、善谈、能吃苦,富思想。……她善于写调查和访问的文字,是一名很好的女记者。”[7]1938年于冈成为汉口《大公报》外勤记者。在重庆,她的采访范围是“陪都”广阔的天地,上至宋氏三姐妹及上层社会活动,下至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她再次用那富有感情色彩的新闻写作手法,做了有声有色的报道。

曾经有人从单纯的体质论出发,认为女记者由于体力所限,在新闻工作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外勤记者方面不便涉足,惟一适合女子从事的就是坐在室内当编辑。“苟令妇女冒风雪于深宵,作险阻之踽行,以从事百般社会之访问,就其体质论之,甚不适当。即勉强为之,非惟不能与男记者竞争,且恐易于丧失妇女之尊严,是乃女记者不及男记者之处。此系天然之缺陷,非人力所能补救也,……妇女而抱定欲为新闻记者之志愿者,与其恃体力以尽瘁事物之活动,不如利用

天然之文艺性质与想像力为得策也。故本书所述，关于女记者之服务，与其在社会上活动，远不如充社会中编辑，较为得宜。”[8]实际上，即便是从新闻事业的发展来看，仅有女编辑而无女访员，则“新闻稿件，仍不免枯偏”。[9]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子教育的进步，特别是新闻事业的发展，女性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相应地，由于现代女记者本身的努力和修养，她们的采访能力渐渐被许多人所认可，采访范围逐渐扩大，而且丝毫不比男记者逊色。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各门的女记者都很活跃。1946年在南京派外勤的女记者有十位左右。《新民报》的浦熙修和《申报》驻南京记者张明都是已经有十余年新闻工作历史的女记者。浦熙修的采访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穷追不舍的认真态度；张明工作夜以继日，有独当一面的工作精神。在采访官场新闻的日子里，“冬天，我们几乎把整个半个夜间的时餐风吹露的伺候在某些公馆的门首，夏天，我们顶着烈日，成日追逐在灰尘飞腾的街衢，对公馆的司阁陪着小心，向要员的接电话的家人讨好”。[10]此外，上海联合报驻南京记者陆慧年也专跑政治新闻，她对一件事的发展常常看得很彻底。中国日报女记者何健民吃苦耐劳，在女记者中，也是不多见的，“她常常凭她两条健而有力的腿，追捕着变化莫测的政治消息，而且总不落人。”[11]

### (三)女新闻工作者的女性色彩

所谓女性色彩，是与男性相比而言的。《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卢小飞女士认为，女记者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女性色彩主要有：容易接近被采访者，达到采访目的；文笔细腻，注意细节描写；关注弱势群体的性别意识等。[12]当代著名女记者樊芸芳在她的《我就是我》(1981-1986年新闻作品选)里说，她一直“追求在新闻作品中能奉献给读者那么一点点只属于我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文采、独特的构思、独特的新意”。[13]这里的“独特”，特别是“独特的感受”，就含有女性色彩。这些女性色彩在中国近现代女记者身上也有鲜明体现。

女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容易接近被采访者，达到采访目的。著名足球女记者李响认为，女记者有男记者不可小视的优势，那就是容易沟通。“足球腕级人物对于女性的采访，他不好拒绝。刚开始时我的这种对比非常强烈。他可能不会对你说很多，但他会跟你说。女孩子让他觉得不会有伤害性。”[14]近现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女记者在采访中也有这种优势，特别是在采访名人政要的时候，这种优势更加明显。据一名为“菊英”的女记者回忆，1934年秋，她到广州一报社做外勤记者。职务是专访要人和富人的家庭，因为女记者在这方面可以得到男记者们采访不到的重要新闻。这些要人们不愿接见记者，有时勉强接见，说话是极谨慎的。而女记者对要人们政见的采访是极轻便的。“因为我被他们认为是女性，而且名义上的专访他们的家庭生活的琐碎事，所以，他们对我没有那种拘束，而且往访必见，同时他们的眷属当然对我也是很接近的。许多要人的政闻，多半是从她们的谈话中间得到的。海上一次要人的门，都有相当收获。因此颇受报馆的经理兼主笔的赞许；同事们对我也打破了男女的成见。”[15]

除了上述之外，女记者之特点还有哪些？“余今且据个人之私意，答之曰：妇女之家政，美术，音乐等之评论，纪事及文学类之作品，则男记者往往不及女记者成绩之优良，以其笔致纤丽，观察明细故也。”[16]女记者文笔细腻，观察的细心和精密，都不是男记者所能及之处。20世纪20年代《时报》驻欧通信员李昭实的文章幽清飘逸，没有一点陈腐气。20-30年代天津《大公报》驻法女记者陈学昭本身是五四时期有名的妇女文学家。她的文章写意抒情，自然流畅。女记者彭子冈笔之所至情之所至，同时还善于抓细节。一次，宋美龄自美国专机飞重庆，孔二小姐同行。于冈在这则消息后面加了一段细节描写：“她们的行李极多，自然有许多重要文件，两卡车装得满满的。有人走近一打(十二只)四四方方的盒子，受到了叮嘱：‘小心点，别走近来，这里面是手表。’”似乎是轻描淡写的几句细节描写，把国民党权贵们的走私丑行揭露了出来。浦熙修在采访旧政协会议代表时，就大量采用细节描写，或抑或扬，自然得体。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是“奴隶的奴隶”。妇女界洞悉民间疾苦，感受最深，而唯有女记者能详尽报道；同时，儿童教育与禁娼妓等问题，与妇女的关系最为密切。妇女、儿童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女记者最易关注弱势群体。这也表现了女记者的女性色彩。

当然，由于长期以来对女性的歧视，女记者们在新闻工作中有过诸多不便。“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从事新闻事业，只有办个以：‘女’或‘妇女’这种字眼做冠词的什么刊物，要想办一般性的刊物——特别是注重国际宣传——的日刊报纸，这算是对于男性的僭越，是很少有成功希望的。”[17]这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著名留法女博士郑毓秀筹办世界新闻协社的计划失败而言的，但这也是当时女性从事新闻工作中所遇困难的一个缩影。更有个别不良报社的经营者，不尊重女记者的人格，企图利用女记者另辟敲诈蹊径的。这令初人新闻界的女记者大失所望。“我怀着无限光明的希望，来干这样辛苦的事业，竟得到这样无聊的教训。当时要不是保持庄重的话，我一定会哭起来的。”[18]

从1897年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诞生到1949年中国女新闻工作者队伍的规模性发展，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坎坷发展过程。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培养了她们的专业能力，塑造了她们的职业精神，磨练了她们的奋斗意志，展示了她们的优良传统。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与传播教研室)

注释

[1]《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565页

[2]2001年10月16日访徐女士

[3]杨挺执笔：《新华女战士》，载于《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石西民、范剑涯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4]林琼、秦秋谷：《〈浙江妇女〉出版始末》，《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3月版。

[5]《南京的女记者》，《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9月19日。

[6]沈兹九：《两封信》，载于《中国之一日》，茅盾主编，生活书店，1936年9月版。

[7]《最近来汉的四位女作家速写》，《大公报》（汉口），190年11月2日。

[8]伍超：《新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发行，1925年1月初版，69页。

[9]任白涛：《综合新闻学》（第2册），商务印书馆发行。

[10]张明：《我是“官场记者”》，《报学杂志》1卷3期，1948年10月1日。

[11]《南京的女记者》，《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9月19日。

[12]2002年4月19日上午访卢小飞女士。

[13]樊云芳：《我就是我》（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14]沈文愉：《李响响了以后》，《北京晚报》2001年11月3日第2版。

[15]菊英：《三个月的女记者生活》，《上海妇女》3卷7期，1939年8月15日。

[16]伍超：《新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发行，1925年1月初版。

[17]任白涛：《综合新闻学》（第二册），商务印书馆发行。

[18]菊英：《三个月的女记者生活》，《上海妇女》3卷7期，1939年8月15日。

（责任编辑：）

收藏本文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7353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 返回首页](#)

[传媒资讯网](#) ∴ [传媒学术网](#) ∴ [传媒考研网](#) ∴ [传媒博客](#) ∴ [传媒社区](#) ∴ [传媒书店](#)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 2001-2009 中华传媒网 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9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